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王仲殊文集

王仲殊 著



I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考古学专刊

甲种第三十八号

王仲殊文集

第1卷

——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

王仲殊 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编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王仲殊文集：全4卷 / 王仲殊著.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6
ISBN 978-7-5097-5115-2

I. ①王… II. ①王… III. ①王仲殊-文集 ②考古学-文集 IV. ①K8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28180 号

王仲殊文集（全四卷）

著 者 / 王仲殊

出 版 人 / 谢寿光

出 版 者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西城区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 3 号楼华龙大厦

邮政编码 / 100029

责任部门 / 近代史编辑室 (010) 59367256

责任编辑 / 宋 超

电子信箱 / jxd@ssap.cn

特约编辑 / 顾智界

项目统筹 / 徐思彦

责任印制 / 岳 阳

经 销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89

读者服务 /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 92.5

版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版

插图印张 / 7


印 次 / 201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 1548 千字

书 号 / ISBN 978-7-5097-5115-2

定 价 / 680.00 元 (全四卷)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A Collection of
Wang Zhongshu's Works

Vol. I

General Introduction to Archaeology and
Case Studies of Chinese Archaeology

Wang Zhongshu



王仲殊先生肖像



王仲殊在日本受奖时摄影

《王仲殊文集》编辑委员会

主任委员 王 巍

副主任委员 白云翔 陈星灿

编辑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巍 王立邦 白云翔 卢兆荫

刘庆柱 齐肇业 张长寿 陈星灿

编辑工作组 (以姓氏笔画为序)

组 长 姜 波

成 员 李 森 姜 波 顾智界

内 容 简 介

本文集收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学者王仲殊先生 70 余篇学术论文以及田野考古调查发掘报告。文集分 4 卷，各卷题目依次为“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和“中国古代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王仲殊先生始终强调考古调查发掘工作必须与历史文献记载相结合，中国考古学研究应该与世界考古学接轨。他的治学方针和研究成果在本文集中得到充分的显示与有力的见证。

本书可供考古学者、历史学者和文物、博物馆部门的研究人员阅读、参考。

自序

1946~1950年，作为一个青年学生，我先后就学于浙江大学史地系（历史部）和北京大学历史系，着重学习中国古代史，兼及日本古代史，皆属以古代文献记载为依据的历史学。

1950年7月从北京大学毕业后，我立即进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以后改属中国社会科学院），从事以田野调查发掘工作为基础的考古学研究。在导师夏鼐先生的指示下，我根据自己在大学时所学专业的具体情况，选择在中国考古学的领域内专攻汉唐时代考古学，原因是考古学研究虽以田野调查发掘的实物资料为依据，亦须参证古代历史文献的记载，而汉唐时代考古学的研究尤其如此。又由于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频繁，关系密切，中国的制度、文化多为日本方面所仿效，所以可以兼攻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在此后数十年的长时期中，我始终按照当初决定的这个大方向从事各项研究，直至今日仍在继续进行。

在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60年代末的将近20年的田野考古工作中，我主要是在河南省的辉县和洛阳，陕西省的西安，湖南省的长沙，吉林省的敦化和黑龙江省的宁安等地发掘从战国、两汉到隋唐时代的各类墓葬，尤其是调查发掘汉唐时代长安城、洛阳城和唐代渤海国上京龙泉府等都城的遗址。我参加《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等发掘报告集的编写，后者由我担任主编和主要执笔者。

从20世纪50年代初期开始，以迄21世纪开头的最近10年余，我从中国考古学、日本考古学和日本古代史研究等各个方面选取题材，总共撰写过100多篇论文，分别发表在《文物参考资料》、《考古通讯》、《考古学报》、《考古》、《考古学集刊》、《华夏考古》、《中原文物》、

《古籍整理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考古与文物》以及《探古求原》等中国国内的学术刊物和文集，其中以发表于《考古》的占绝大多数，也有一部分编入《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日本的《朝日杂志》、《历史与人物》、《邪马台国》、《橿原考古学研究所考古学论考》、《考古学杂志》、《就实女子大学史学论集》、《京都埋藏文化财情报》、《东亚细亚的古代文化》、《丹后文化圈》、《亚细亚中的冲绳》等刊物和文集也曾登载过我的有关的论文，有的是我用中文写成，由日本方面译成日文，有的则是我自己用日文撰写的。100多篇论文的题材、内容是多种多样的，就考古学上的遗迹而言，要以论述古代都城、宫殿及墓葬为主，在器物学方面则考察铜器、铁器、漆器、印章、钱币乃至玻璃器皿之类，而以古代铜镜为研究的重点对象。应该指出，其中也有一些论文是属于日本古代史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以后，我在国内外出版的专书计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韩文译本）、《三角缘神兽镜》（日文）、《从中国看古代日本》（日文）以及《中日两国考古学·古代史论文集》（中文）等，而与外国学者合著的则有《探求日中古代文化的交接点》（日文）、《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日文）、《古代日本的国际化》（日文）、《三角缘神兽镜之谜》（日文）、《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日文）等多种，各书的基本内容略如书名之所示。

多年以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作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直属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为各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出版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众多的学术出版物之中，知名专家的文集、全集则是其中的重点之一。2011年3月，继若干年前出版的《唐弢文集》、《夏鼐文集》之后，又完成了《罗尔纲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影响大，效果卓著。于是，出版社的领导上又作出新的计划，决定编辑《王仲殊全集》，公开出版。

我接到出版社的通知，感到十分荣幸，并表示愿意积极配合，努力协作，以求编辑工作的顺利开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领导上也决定要在各方面加以大力的支持，并成立编辑委员会和编辑工作组，以加强编辑工作的进行。

我从实际情况出发，主张应与唐弢、夏鼐两先生一样，称我的这部

著作集为“文集”而不称“全集”，尽管《罗尔纲全集》是名副其实的大著作集。

我的这部《文集》共分4卷，每卷约40万字，4卷合计约160万字。第1卷题为“考古学通论及中国考古学的若干课题”，包含21篇论文，另有4篇纪念性文章作为附录。第2卷题为“中日两国古代铜镜及都城形制的比较研究”，包含22篇相关的论文。第3卷题为“古代中国与日本等东亚诸国的关系”，包含26篇相关的论文，另有关于外国考古学概说和外国考古访问记各1篇，作为附录。第4卷题为“中国古代遗址、墓葬的调查发掘”，由5篇考古调查发掘报告组成，并配有许多插图和图版。

我出生于1925年10月，今年已届87岁。2005年10月，我满80周岁。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领导上特地编著题为《新世纪的中国考古学——王仲殊先生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的大篇幅书，书中所收同志们的论文达60余篇之多，共计120余万字，并由当时的副所长王巍同志（2006年以后为所长）撰写《王仲殊先生传略》一文，置于全书之首，同时又编成《王仲殊先生著作目录》一篇，作为附件。现在，我将王巍同志为我所写的《传略》和我本人的《著作目录》（经过最近的增补）置于这部《文集》（第1卷）的前头，以供广大读者参阅。

王仲殊

2012年10月15日

王仲殊先生传略

王 巍

王仲殊先生 1925 年 10 月 15 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父亲是宁波的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兼任报社的文艺副刊编辑，并长期受聘为著名的天一阁文献委员会委员。王先生从少年时代开始，便受父亲的培育、熏陶，在古典文学和历史文献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抗日战争期间，王先生离开宁波，辗转于嵊州、新昌、宁海各地，历尽艰辛，完成了初中和高中的学业。1946 年夏秋之际，他先后考取厦门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复旦大学和浙江大学等国内第一流大学，却就近选择最后考取的浙江大学，攻读历史学。1949 年新中国成立，浙江大学院系调整，王仲殊听从浙大教授谭其骧先生劝导，转学到北京大学。

1950 年 7 月，他从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当时正值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即将成立，需要增添新的研究人员。经北大教授张政烺先生推荐，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梁思永先生欣然接纳王仲殊于同年 8 月初入所，并多加指导、勉励，热忱至高。这样，王仲殊便成为考古研究所成立后第一个从大学毕业分配而来的青年研究人员。可以说，王仲殊先生是考古研究所成长、发展的重要实践者和见证人之一。

1950 年 9 月，夏鼐先生到考古研究所就任副所长之职，不久便担任王先生的导师。在以夏先生为主的前辈学者的殷切关怀和大力帮助下，王先生在工作上迅速成长，研究上多见成绩。1958 ~ 1965 年，他被委任为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秘书，又任汉唐考古研究组副组长（组长由夏鼐副所长、所长兼任）。1978 ~ 1982 年，他升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

研究所副所长，进一步成为所长夏鼐先生的得力助手。1982~1988年，王仲殊先生继夏鼐先生之后，被委任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兼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并任《考古学报》和《考古学集刊》的主编。在个人学术职称方面，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延误，王仲殊先生于1979年被破格提升为研究员（相当于大学教授）。1981年他被聘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并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直接评定为博士生导师。从1991年开始，他享受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做出突出贡献的政府特殊津贴。1992~1998年，他重新担任考古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任；1999年至今，又改任学位委员会委员之职。

此外，1979~1988年王仲殊先生曾任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1980~1985年曾任《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兼《秦汉考古》主编，1996~1999年任《辞海》编辑委员会委员兼考古学分科主编，2002年以来又任《大辞海》考古学分科主编。1988~1998年，王仲殊先生连任第七、第八两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

王仲殊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成果亦为国际学术界所称道。早在1973年，他被聘为秘鲁国立库斯科大学的名誉教授。1988年，德国考古学研究院则授以通讯院士称号。1990年，亚洲史学会推举王仲殊先生为评议员（相当于常务理事）。1995年，日本冲绳学研究所又聘请其为客座研究员。1996年，继巴金、费孝通之后，王仲殊先生被日本方面授以“福冈亚洲文化奖”大奖，这更是十分难得的荣誉。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在1966年以后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许多学术研究机构，包括中国科学院所属人文·社会科学的各研究所在内，几乎皆被迫停业，唯独考古研究所因受周恩来总理关爱，得以继续开展业务。当时，王仲殊先生受命主持考古研究所的工作，凭借其与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之间的亲密交往关系，尽力保护遭受迫害的老一辈学者，尤其是将下放在外省农村劳动的夏鼐先生、安志敏先生等调回北京，恢复其在考古研究所的职务。1971年夏，王仲殊还与夏鼐先生一同为郭沫若院长起草致周恩来总理的请示报告，恳请《考古》、《考古学报》等复刊以应国内外需要，立即蒙周总理批准，乃使考古研究所的学术研究得以进一步开展，为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考古事业的新的光辉历程打下极为重要的基础。

学问与人品往往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这在王仲殊先生身上显得格外清楚。众所周知，王仲殊是夏鼐先生的学生和接班人。与夏鼐先生一样，王先生为人正派、诚实，襟怀坦白，表里如一。他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更不曲意逢迎，取悦于别人。针对一些不良的倾向，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无所畏惧。王仲殊先生学风严谨，立论扎实、可靠。在他的学术论著中，从不轻易发表没有把握的见解，更不仅凭主观臆测而大事渲染。实事求是，严于律己，理之所在，决不退让，这是王仲殊先生的治学之道。

二

1948年冬，在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的夏鼐先生拒绝迁移台湾，坚决留在大陆。1949年秋全国解放，夏先生应聘在杭州的浙江大学任教授，直至1950年夏末。当时，王仲殊已转学到北京大学，与夏先生不曾相识。然而，夏先生在浙大任职期间，多次听谭其骧教授（历史地理学）、夏禹勋教授（日本语文）等老师言及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秀成绩，印象至深。

1950年9月中旬的一个夜晚，夏鼐先生自杭州乘火车到达北京。次日一早，他初次与王仲殊在考古研究所的办公室见面，立即为王仲殊指引治学的方向。夏先生熟知历史文献和日本语文是王仲殊在学业上的优势所在，故明确主张王仲殊应专攻在研究上必须充分以历史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发掘相结合的中国汉唐时代考古学，又因汉唐时代中国与日本交往密切，而古代日本在制度、文化上多受中国影响，故可兼攻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数十年来，夏鼐先生指引的治学方针始终为王仲殊所遵循，直至今日而不改。

1950年10月初，王仲殊便跟随夏鼐先生到河南省辉县，参加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正是遵照上述夏鼐先生为他规定的专业方向，王仲殊在辉县琉璃阁发掘的对象几乎全是汉代墓葬。由于夏先生的言传身教，严格要求，开始奠定了他在田野考古学上的技术基础。1951年4月至7月，夏鼐先生还带领王仲殊到河南省从郑州到浍池的中西部地区进行对各个时代遗址的调查发掘，决定以汉唐时代考古学为专业的王仲殊也参加了几处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由于新

石器时代遗址与汉代墓葬在发掘工作的操作上各有特点，互为补充，从而使他进一步增长了关于田野考古学的理论、方法等各方面的知识。

此后，就较为重要的项目而言，王仲殊先生先后参加了湖南省长沙的汉代墓葬、陕西省西安的汉长安城遗址、河北省满城的汉代陵墓、吉林省敦化的渤海墓葬、黑龙江省宁安的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等的发掘工作。其中，1956~1962年汉长安城遗址的发掘由他主持，使他成为考古研究所汉长安城工作队的第一任队长，所获成果为以后该都城遗址的长期发掘打下坚实的基础。1964年春秋两季，他主持敦化六顶山渤海墓葬和宁安渤海镇渤海上京龙泉府遗址的发掘，规模大、效率高，收获丰富，为中国汉唐时代边疆考古学的开展做出积极的贡献。题为《六顶山与渤海镇——唐代渤海国的贵族墓地与都城遗址》的发掘报告书由王仲殊先生任主编，内容充实，叙述清楚，出版后多受好评，并荣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优秀成果奖”和“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等重要奖项。

在长期的考古学研究的实践中，王仲殊先生勤奋好学，孜孜以求，逐渐形成了具有本人自身特色的知识结构和治学方式。50多年来，单就中国考古学范围之内而言，他的论著相当丰富。在前已述及的田野工作方面，有与其他人合著的《辉县发掘报告》、《长沙发掘报告》和上述《六顶山与渤海镇》三部发掘报告，又有个人独著的《洛阳烧沟附近的战国墓葬》、《汉长安城考古工作的初步收获》和《汉长安城考古工作收获续记——宣平城门的发掘》等单篇的发掘报告和简报。在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方面，则有个人独著的《汉代文明》（英文）、《汉代考古学概说》（中文，有朝鲜文译本）等专书，又有《沂南石刻画像中的七盘舞》、《略论杯盘舞及其时代》、《汉潼亭弘农杨氏冢茔考略》、《中国古代墓葬概说》、《中国古代都城概说》、《论吴晋时期的佛像夔凤镜》、《吴县、山阴和武昌——从铭文看三国时代吴的铜镜产地》、《“青羊”为吴郡镜工考——再论东汉、三国、西晋时期吴郡所产的铜镜》、《“黄初”、“黄武”、“黄龙”纪年镜铭辞综释》、《“建安”纪年铭神兽镜综论》、《黄龙元年镜与嘉兴元年镜铭辞考释》、《关于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再论好太王碑文辛卯年条的释读》等个人独著的论文共约数十篇，其中不少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重视，获得好评。

作为中国考古学界的重大事项之一，《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

于1986年8月正式出版。王仲殊先生不仅作为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协助主任夏鼐先生负责全书的设计、规划和编辑事务，而且亲自承担《中国古代墓葬制度》、《秦汉考古》、《秦汉墓葬》、《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铜镜》、《汉代铁器》、《汉代铜器》、《汉代漆器》、《汉代陶瓷器》等20多个条目的撰写，字数近20万。特别是卷首开头最重要的《考古学》序目为夏鼐、王仲殊两先生共同合作撰写，高屋建瓴、深入浅出地论述了考古学的定义，研究的范围、目标和方法，学科的分支及其与其他学科的关系等等，并有条不紊地叙明世界考古学的发展史，内容详细、充实，论据确切可靠，至今仍是中國考古学界广为遵循的纲领性大著作。

三

如前所述，按照夏鼐先生为他设定的治学方针，王仲殊先生在研究以汉唐时代为中心的中国考古学的同时，也注重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钻研。早在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王仲殊大量阅读日本的古代文献及近代、现代的考古学和古代史书刊，以求充实自身的基本知识，并把握对方的学术动态。考古研究所图书馆收藏甚丰，除中国本国的书籍、刊物以外，也有不少外国的书刊，尤以日本的为多。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中国国家图书馆（前称北京图书馆）皆兼藏日本文科方面的大量书籍、刊物，应有尽有，自可充分借阅，而王先生个人收集日本书籍、杂志、报刊颇多，更可随手检阅，十分便利。从1981年开始，王先生应邀访问日本，至今已达25次之多，每次都在日本参加考古学·古代史讨论会，作公开的学术讲演，顺便赴各地考察古迹，参观博物馆等，又为他对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开创新的必要的条件。

经过长期的努力，王仲殊先生在日本考古学和古代史的研究上取得了很大成绩。他的研究成果充分表现于各种专著和许多论文，它们多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有些论文则是由王先生本人直接用日文写作的。在专著方面，计有共著或独著的《探索中日古代文化的交接点》（共著）、《奈良·平安之都与长安》（共著）、《三角缘神兽镜之谜》（共著）、《古代日本的国际化》（共著）、《三角缘神兽镜》（独著）、

《从中国看古代日本》（独著）、《三角缘神兽镜与邪马台国》（共著）等书，而王先生独著的各种论文则已多达数十篇。除1981年以来对平城京、平安京等日本古代都城研究和对称为“三角缘神兽镜”的日本古代铜镜研究的二大系列论著将在后文专门介绍以外，这里先以早在1959年发表的《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和1972年发表的《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两篇论文为例，稍加叙说。

在江户时代中期的1784年2月，一枚闪闪发光的金印在日本九州北部的志贺岛（今属福冈市）出土。据计测，印面为2.35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2.23厘米。印文“汉委奴国王”五字，篆体，阴刻。如《后汉书·东夷传》所记，这显然是汉光武帝于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通过来访的使者赐予倭的奴国之王的。所刻“汉委奴国王”五字应理解为“汉·倭·奴国王”，而“委”字则为“倭”的简体。然而，直到20世纪50年代之末，日本研究者众说纷纭，多有异论，特别是怀疑其为贗作，不是真品，主要的理由是印纽作蛇形，印文为刻凿而非铸就，不合规制云云。

1956年12月，我国云南省晋宁石寨山的西汉滇国墓出土1枚金印，印面2.4厘米见方，纽作蛇形，通纽高1.8厘米。印文“滇王之印”4字，篆体，阴刻。作为发掘单位的云南省博物馆举出各种理由，认为此印不是中国西汉王朝所赐，而是滇国本民族自制。但是，王仲殊先生在《考古》杂志上发表《说滇王之印与汉委奴国王印》的论文，在否定云南省博物馆的意见的同时，确认“滇王之印”金印应如《史记·西南夷列传》所记，为汉武帝于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所赐予。王仲殊先生以“滇王之印”印纽亦作蛇形，印文亦出于刻凿为主要依据，指明日本志贺岛出土的“汉委奴国王”金印为真品而非伪作。从此以后，怀疑论的迷雾消散，作为2000年来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史的重要实物见证，金印发出更为灿烂、明亮的光辉。

1972年3月，在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明日香村发掘了高松冢古坟。古坟石室内有着保存良好的壁画，其内容包含四神图、天象图和男女人物像等，绘描优美，装饰精良，色彩鲜明，实属空前大发现，轰动全国。王仲殊在郭沫若先生处得见快速送来的日本报纸关于高松冢古坟的详细报道，乃执笔撰作《日本高松冢古坟简介》之文，发表在复刊不久的1972年第5期《考古》上，立即引起日本学术界的注意。九州大